

中国通史

(全新修订版)

严谨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写给中国人自己的国史入门书

解析中国历史背后的逻辑，见证五千年的纷纷扰扰、恩怨情仇

吕思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国通史

(全新修订版)

严谨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写给中国人自己的国史入门书

吕思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 / 吕思勉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43-5461-4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8850号

中国通史

作 者：吕思勉

策 划：许晓善

责任编辑：许晓善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8.5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461-4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中国通史》序

中国通史写作像中国历史学一样悠久，孔子整理《春秋》，墨子曾见到过的“百国春秋”，以及孔门弟子的《春秋》三传，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通鉴》，直至近世章太炎的“通史议”，梁启超的通史实践，后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等人的《中国通史》写作，足以表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厚的通史写作传统。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写一部具有现代感的中国通史，曾经是许多历史学者心底的一个宏愿。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

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传世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因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百万字，一部思想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追究一下编写者，尤其是主持者学术素养，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没有贯通理解，那么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从细节上突破呢？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出版了一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这些史书在那个特殊时代对于现代人理解古代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无不出于主题先行，或以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因为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或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历史叙事基调，因为经典作家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或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的反抗作为近代史叙述主线，因为经典作家不仅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近代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而且是近代中国不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些先行的主题规范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通史、近代史的基本样式，然而由此却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难道历史真的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历史真的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一定有一个真相，历史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因为历史学家推崇农民战争，就成为农民战争史。历史某一个主题被刻意放大，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之前，并没有对历史文献有全面阅读，有整体架构、把握。

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最勤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对南京图书馆的泛读，吕思

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从这个视角反观章太炎、梁启超之后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中国通史类作品，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这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历史的作品固然给我们以巨大启发，但其主题先行有所侧重的描述，也委实遮蔽了许多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二十世纪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学者还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以及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最近几年相继出版的日本、哈佛学者写作的中国史。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有益智功能，也都不同程度描述了中国历史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重点，都值得阅读。

但是，如果从系统性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外学者中国通史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写作的中国通史。据粗疏阅读，我觉得，吕思勉中国通史与同类作品相比，至少具有这样几个优点：

第一，吕思勉读书最勤。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自六七岁开始，吕思勉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

第二，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一遍又一遍地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这个标准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阅读、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马勇，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1938），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 120 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1939）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吗？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

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统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统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吗？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

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需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业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在。（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个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个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预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

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窄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谑，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001 自序

002 绪论

中国文化史

002 第一章 / 婚姻

021 第二章 / 族制

034 第三章 / 政体

047 第四章 / 阶级

062 第五章 / 财产

079 第六章 / 官制

092 第七章 / 选举

107 第八章 / 赋税

122 第九章 / 兵制

140 第十章 / 刑法

155 第十章 / 实业

170 第十二章 / 货币

182 第十三章 / 衣食

197 第十四章 / 住行

211 第十五章 / 教育

- 223 第十六章 / 语文
236 第十七章 / 学术
262 第十八章 / 宗教

中国政治史

- 274 第十九章 / 中国民族的由来
279 第二十章 / 中国史的年代
281 第二十一章 / 古代的开化
289 第二十二章 / 夏殷西周的事迹
294 第二十三章 /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299 第二十四章 /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303 第二十五章 / 古代社会的综述
307 第二十六章 /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310 第二十七章 /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315 第二十八章 /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320 第二十九章 / 前汉的衰亡
-

- 323 第三十章 / 新室的兴亡
327 第三十一章 / 后汉的盛衰
332 第三十二章 /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336 第三十三章 / 晋初的形势
340 第三十四章 / 十六国时期（上）
344 第三十五章 / 十六国时期（下）
348 第三十六章 / 南北朝的始末
354 第三十七章 /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357 第三十八章 /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360 第三十九章 / 唐朝的中衰

| | |
|-----|-----------------------|
| 364 | 第四十章 /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
| 369 | 第四十一章 /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
| 374 | 第四十二章 /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
| 378 | 第四十三章 / 北宋的积弱 |
| 383 | 第四十四章 / 南宋恢复的无成 |
| 389 | 第四十五章 /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
| 394 | 第四十六章 / 汉族的光复事业 |
| 399 | 第四十七章 / 明朝的盛衰 |
| 403 | 第四十八章 / 明清的兴亡 |
| 409 | 第四十九章 / 清代的盛衰 |

| | |
|-----|-----------------|
| 413 | 第五十章 / 中西初期的交涉 |
| 418 | 第五十一章 / 汉族的光复运动 |
| 423 | 第五十二章 / 清朝的衰乱 |
| 428 | 第五十三章 / 清朝的覆亡 |
| 433 | 第五十四章 / 革命途中的中国 |